社会科学与教育 2026年第10期
ISSN: 3079-4420

云南古代诗词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

李瑞珩，杨筱哲，张晶婷
滇西应用技术大学，云南大理，中国

【摘要】云南古代诗词是观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生成历程的独特文本。本文以“山川同脉、华风同轨、美美与共、万里同商、群星璀璨、家国同构”六个维度重构其共同体书写谱系，采用诗史互证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加以阐释。研究认为：云南诗词中的国家认同并非单向灌输的结果，而是经由地理共情、制度同轨、民俗互鉴、经济互嵌、文人酬唱与家国同构等多重机制，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生成的深层文化自觉；汉语诗律既是各民族诗人共同的形式准则，也是情感共情与历史互证的媒介。挖掘这一文学传统，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云南古代诗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诗史互证；交往交流交融；多元一体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科普项目：《古诗词中的云南：从边地书写到国家认同》（编号：SKPJ2025079）；滇西应用技术大学教学质量工程项目：《课程思政背景下地域文化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创新研究》（编号：25KC01）

1.引言

在中华文学版图中，云南处于“边地”的位置：地理上远离中原，史籍中常被冠以“徼外”之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1]。然而恰恰是这片边地，产生了数量可观、品质精良的古代诗词——从汉代《渡兰沧歌》《僰道谣》的质朴歌谣，到南诏骠信《星回节》；从明代杨慎等谪滇诗人的创作，到李元阳、木公、高奣映等本土多民族诗人的创作，构成了一条绵延近两千年的诗词长河。这条长河最值得追问之处，不在于“边地也能作诗”这一事实本身，而在于：这些诗词如何书写“边地”？边地书写如何一步步转化为家国书写。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在历代云南诗词中，“边地”如何被书写为“家园”？云南本土诗人与谪滇宦滇诗人如何在汉语诗律这一共同形式中实现跨民族、跨身份的对话？这种文学现象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之间存在怎样的同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文学的内部考察，也需要将诗词放到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量。

现有的云南古代诗文研究大致沿三条线索展开。其一，民族作家群研究。如周锦国[2]等学者对明清云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地域书写的考察，揭示了少数民族家族作家群以汉语写作的具体机制。其二，谪滇诗人研究。如周雪根[3]、焦云宏[4]、徐晶晶[5]围绕杨慎等谪滇诗人的行旅诗、怀古诗、哀祭文等展开研究，认为谪滇文人在云南的生活经历成为其人生中不可磨灭的记忆。其三，云南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茶志高[6]等学者对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的系统梳理，李潇云[7]、李超[8]、董雪莲[9]等学者对明清云南诗学特征与价值的概括，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本文以《云南丛书》所收《滇南诗略》《滇诗拾遗》《滇词丛录》等总集及文人别集为基础，兼顾云南本土多民族诗人与谪滇宦滇诗人两类创作主体，所引诗句摘自《云南历代诗词选》[10]；方法上，采取诗史互证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在框架上，以“山川同脉、华风同轨、美美与共、万里同商、群星璀璨、家国同构”六个专题重构云南诗词的共同体书写谱系。这一专题式框架并非随意的内容分类，而是对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自然地理、制度文化、民族民俗、社会经济、精神生活、政治认同六个层面的生成机理。

2.云南古代诗词的生成语境：双重诗学传统

云南古代诗词的创作主体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是本土诗人，如明清以降，丽江木氏土司家族的木公、木青、木增，姚安高奣映家族，浪穹何邦渐何氏家族，剑川赵氏赵炳龙家族，赵州师范师氏家族等。他们

生长于边地，却以汉语诗律书写本乡本土的风物与情感。另一方面是谪滇宦滇诗人如杨慎、侯琎、朱应登、李贽或贬谪，或仕宦，携中原诗学传统入滇，在滇地山水与滇地人事中重新安放自己的诗心。

两种传统并非彼此隔绝，而是在滇地持续交汇。杨慎与李元阳、张含、杨士云、胡廷禄、王廷表、唐锜等人相互酬唱，时谓“杨门六学士”，而在此文人网络之外，纳西族土司木公与杨慎的交往，则展现了另一种跨越民族与地域界限的诗学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共同的汉语诗律在这里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一种文学形式，也是一种文化制度——掌握它，意味着进入中华文化的表达系统；运用它书写本土经验，则意味着地方经验被接纳入普遍的审美秩序。正是在这一形式与内容的双向运动中，云南诗词天然成为“多元一体”的文学标本。

3.“多元一体”的六种诗意表达

其一，山川同脉：地理书写中的共有家园。云南诗词中数量最多的是山水书写。汉《渡兰沧歌》开其先河：“汉德广，开不宾。渡博南，越兰津。渡兰沧，为他人。”此歌谣淡中有味，写远行之苦，颇有汉乐府风味。此后，逯昶写点苍山“极目望点苍，芙蓉倚天阙”，李元阳泛洱水“洱波三万顷，轻舟泛长风”，杨慎作《滇海曲》咏滇池烟波“昆明池水三百里，订花海藻十洲连。”，侯琎状高黎贡山之险“险道岩峣锁眉黛，绝巘突兀摩穹窿”，郭庭梧望抚仙湖之清“湖水清澄万顷波，仙人峰起似婆娑”，直至清代谢琼醉题大观楼壁、蒋元楷作《石林歌》，苍山洱海、滇池温泉、高黎贡山、金沙澜沧，悉数进入汉语诗歌的意象系统。关键在于，这些山川未被书写为“化外之地”：诗人以中原山水诗成熟的审美语汇观照滇地风物，使苍山不异于五岳，洱海可比于洞庭。地理差异被审美共情所弥合，山水书写因此成为“同饮一江水”的共同体意识的感性基石。

其二，华风同轨：制度认同的诗史互证。元代张翥《送刘侯赴大理》中有“六诏星文开井络，两关鸟道插天梯”高度概括了南诏大理国的历史沿革，表明诗礼筹边的主题。明代李元阳《宝塔行》《感通寺》、清代师范《次大理》、高奣映《铁柱》等作品，则围绕南诏大理的历史遗迹展开咏怀。南诏铁柱、大理三塔、诸葛营、万人冢，这些地景在诗中反复出现，构成了一个象征体系：边疆政权对中原制度、礼仪、正朔的承续与向往。陈佐才《万人塚》、龚敏《万人塚歌》“唐相贪功勤远伐，廿万官兵一朝没”咏南诏与唐军的战事，其立场并不在渲染族群对立，而在痛悼战争、追怀和解。“华风同轨”书写的实质，是边疆与中原共属一个政治文化秩序的历史自觉在文学中的投射。

其三，美美与共：民俗书写中的互鉴共生。唐代骠信《星回节》写道：“自我居震旦，翊卫类夔契。伊昔经皇运，艰难仰忠烈。不觉岁云暮，感极星回节。元昶同一心，子孙堪贻厥。”星回节即今火把节，南诏王以汉语咏本族岁时，既记民族古俗，又明“居震旦”之志，民俗记忆与国家认同在同一首诗中浑然交融。元代文璋甫咏火把节，明代兰茂写端午，杨慎作《滇南月节词》逐月记滇中风物，清代杨品硕《丽江竹枝词》、李玉湛《墩汛竹枝词》以竹枝词这一源自巴渝的乐府形式歌唱纳西等民族的生产生活。纳西族土司以汉诗写春会、杨品硕与李玉湛用竹枝词记录边地风情，将地方俗语融入文本，语言的壁垒在诗意中悄然消融。从南诏王骠信登高以怀古言志，到明代兰茂借屈原事表达个人操守；从明代杨慎效仿欧阳修以十二月令形式作《滇南月节词》，到杨品硕、李玉湛发挥竹枝词“以诗证史”的存史价值，华夏文脉的传统在边地代代相承。而在汉文化全面进入云南的明清时期，兰茂“独立空山又重午”的孤怀，文祖尧“人事忽惊新岁月”的感慨，谢体仁“丰年从此祝”的祈愿，更共同传递着各民族对家国故土安宁祥和的殷殷期盼。岁时礼俗、节庆歌舞、耕作背水，纷纷进入汉语诗歌。节庆的共享、形式的互借，正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古代形态。

其四，万里同商：经济互嵌下的共同繁荣。唐代《贾客谣》以商人口吻写道：“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囊中络赂绝。”四季欲归而不得归的商贾形象背后，是一条穿越高黎贡山、连接内地与缅印的古老商路。明清以降，茶、铜、盐、玉成为云南诗词中的高频经济意象。许廷勋《普茶吟》从山川灵气写到茶芽萌发，从民族采摘写到商贾盘剥、土官抽分，完整呈现普洱茶由山林物产转化为商品与贡品的过程。诗人赞其“味厚”“香清”，更痛惜“满园茶树积年功，只与豪强作生活”使一杯普茶兼具清香与苦味。黄炳堃

《采茶曲》则采用十二月歌形式，逐月铺陈采茶时令、茶叶品质与村姑劳动，再以“采茶争似饮茶易，莫忘采茶人苦辛”点醒读者：风雅茶事背后，是山路奔走、拣择烘焙、岁时不息的劳动。茶在这些诗中，既是云南名产，也是民族地区生计、女性劳动、商品流通和社会关系的汇聚点。矿冶与物产开发，展示了云南经济的另一重厚度。万钟杰《铜矿歌》以宏阔笔势描写铜矿开采与冶炼，矿工“夜以继日恣剜镌”，在幽深洞窟中开掘“边隅之良田”。诗中既赞天工造物，又强调“人事天工须两全”，体现清代士人以经世致用的眼光看待资源、财政与民生的思想。地方特产与市井消费，则使云南社会经济呈现更细腻的生活面貌。释大错《卖雪诗》记大理苍山六月不化之雪被山民“取而货于市”，雪由山间自然之物变为城市商品，银杓、磁瓯之间，既有风雅清赏，也有人情交易。杨慎《渔家傲·滇南月节》写二月滇南春游，沽酒、宝钗、银钏、亭馆、歌声交织，反映明代云南城市游赏与消费生活的活跃。朱昂《元江槟榔行》则从槟榔种植、采摘、穿串、街头售卖写起，进而揭示贫家因习俗消费而承受的负担，在风土描写中寄寓民生忧思。杨仲魁《冬虫夏草》虽篇幅短小，却表现了云南的异产因药用价值而被珍藏与流通，展示出边地物产进入士人生活和商品市场体系的过程。物资的流动早已将边疆与内地编织为利益与共的整体，而诗歌为这一经济互嵌赋予了情感的温度与道德的正当性。

其五，群星璀璨：文人酬唱中的跨身份对话。云南诗词中保存了大量赠答唱和之作，如李元阳《宁海泛舟别升庵》、张含《秋宵怨怀升庵》、杨士云《升庵先生至榆》寄寓对杨慎之深情；何渐邦、当担作《吊杨升庵先生》，悼念跨越了身份与族际的界限；木公《逐痴堂寄题愈光》、释读徹《次答徐渭友》，则是土司、僧侣与士夫之间的诗简往来。唱和酬答是古典诗学中最具社交性的文体，它要求同题、同韵、同调——在形式上先已达成契约，再在内容上交换情感。谪宦、土司、僧侣、布衣之间的频繁酬唱证明，诗律是超越身份的共同语言，交往交流交融在文本层面留下了确凿而精美的印记。

其六，家国同构：怀乡忧国中的认同升华。这是六维中最具情感强度的一维。郑氏大长和时布燮《思乡作》：“泸北行人绝，云南信未还。庭前花不扫，门外柳谁攀。坐久销银烛，愁多减玉颜。悬心秋夜月，万里照关山。”边臣之愁，结于“秋夜月，万里照关山”——云南的月与中原的关山共悬一天，乡愁的空间被一轮明月打通。杨慎《宿金沙江》以“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收束半生贬谪之悲，而这份悲慨在《黄河》《秋兴》式的咏怀传统中获得安放。杨一清咏黄河、写秋兴，赵士麟《度黄河》、张汉《岳忠武行师处》、段昕《满江红》，皆以个人遭际接入家国叙事。由思乡而忧国，由乡土而家国，边地书写最终汇入国家认同的洪流——“多元”在“一体”中获得安放，而“一体”因“多元”的深情书写而血肉丰满。

4.从边地书写到国家认同：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

综观六维书写，云南诗词中的共同体意识经由三条相互交织的路径生成。

第一是形式的规约。汉语声韵格律作为共同的形式准则，使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诗人进入同一表达系统。木公以纳西土司之尊而工于近体，阿盖以蒙古贵族之女而作汉诗，形式的学习与运用本身即是对中华文化秩序的深度参与。

第二是情感的共情。乡愁、宦情、山水之好、死生之悼，这些普遍情感跨越族际与身份的边界，在唱和与共鸣中积累为共享的情感记忆。布燮的月、杨慎的江声，读者无论居于滇或居于中原，皆能感同身受，共同体的根系首先扎在共同的人性之中。

第三是历史的互证。诗与史相互发明：《渡兰沧歌》与博南古道的开通互证，《铁柱》《宝塔行》与南诏大理的制度史互证，《贾客谣》与茶马古道的贸易史互证。文学记忆由此沉淀为族群共享的历史记忆，而历史记忆正是国家认同最深的地基。

尤须指出，这一认同的生成不是中原对边疆的单向涵化，而是双向乃至多向的建构：本土诗人以汉诗写本土，是将地方经验普遍化；谪滇诗人以汉诗写滇地，则使边地风物经典化。两条路径相向而行，共同书写了“多元一体”的文学版本。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 中华书局，2007：839.
[2]周锦国.明清时期白族家族式作家群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8.

[3]周雪根.“以罪得诗诗愈奇”——明代滇云谪流诗人诗歌概观[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1（2）：59-68.
[4]焦云宏，金梅. 杨慎诗词中的云南印象[J].云南开放大学学报，2014，16（2）：35-38+43.
[5]徐晶晶，王军涛.杨慎谪滇哀祭文研究[J].青年文学家，2020，（2）：103.
[6]茶志高.清人编纂云南诗文总集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7]李潇云.清代云南诗学的特征和价值[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5（2）：103-107.
[8]李超，李丹.清代云南文学研究[J].学术探索，2017（7）：36-39.
[9]董雪莲. 明末清初云南诗坛复古风气及后世影响[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9（6）：105-111.
[10]张文勋选注.云南历代诗词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3.